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文献资料】	对当前文革形势的分析	朱成昭
【劫后反思】	造反与造神：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的思考	吴祚来
【往事非烟】	《云卷云舒——清华笔记》（选载之四）	傅培程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文献资料】

对当前文革形势的分析

· 朱成昭 ·

（朱成昭1967年2月4日在全院大会上的“检查”报告（“八大观点”），东方红整风委员会录音记录，宫保军录音整理。）

一、运动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1、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发表，给革命群众带来欢欣鼓舞，《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认为社论发表早了，感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未批透批深，再晚发表半个月，北京的形势会更加好。社论的发表我们感到突然，是大阴谋。我们支持红色尖兵到报社造反，当陈伯达同志说走光了也没关系，后来各校倾校去串联，影响北京市的文化革命，长期想不通。如何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常常考虑。大串联一开始，人马几乎走光了，我校也走了，当时北京市文化革命进行缓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新反扑，学校几乎停顿状态，搞斗、批、改不可能，留北京的人，互相抄大字报，印首长讲话，交换首长讲话，研究和分析首长讲话，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首长讲话对运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就把主席著作学习丢在了在一旁，把十六条学习丢在了在一旁。就这样呢，我们感到，首长怎么提的就怎么做，长久这样下去以后，群众的精神状态发生了一种变化，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我们认为，原先那些很爱动脑筋的，很会动脑筋的同志，经常提个为什么，运动怎么搞，经常提到这问题的一些同志，结果到后来就变得脑筋比较迟钝起来了，原先呢，事事问个为什么，后来就不怎么问了，而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中央首长怎么讲，看中央文革的态度怎么样？你要作一个工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你要做一个工作，布置一个工作，群众首先向你问的，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文革同意不同意这样做？你要是讲这次工作中中央文革不知道，那要布置下去呀，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一阶段，在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当中，逐渐产生了奴隶主义思想，不爱动脑筋的思想，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就很难发挥。因此，那一阶段普遍出现了群众感到没有事可作，要等待总部的布置，而自己就很少主动地去找工作，主动去寻找事情去做。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和革命的创造性就发挥的很不够，等着总部的通知，等着总部的布置。总部呢，也等着中央文革布置。一层层下来，有很多同

志不愿在北京干，东方红的一部分同志都不愿在北京干，希望到外地去，有刚从外地回来，看到学校里边没什么工作或没什么事，也就跑到外地去了。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在我们思想当中，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我们东方红中间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10月份时候，我们公开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在东方红报上发表了一个社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当时，我们还打算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学校的一切权力，并且对我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做了一个布局，想夺权，夺权以后怎么做，我们都做了一个初步安排。当时，我们的想法提交中央文革后，接着东方红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以后，中央文革同志把我们找去了，找去了批评了我们，批评里有那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在那阶段作法有些过火，比如，抄红卫兵的家，有些过火，因为我们抄红卫兵家过火，就这点批评是正确的，第二点，就因为我们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种提法不好，不策略，另外，说我们要接管学校一切政权，这样包袱太重，并且，最后说：你们以后要提什么口号，提出什么东西，要先给中央文革商量好，因为你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一个组织，一面红旗，让你们提出口号就对整个运动有所影响，就在这种形势下，在以后，我们在作工作当中就感到有所压力，我们感到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工作上头犯了错误，而影响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呢，在后来一个阶段，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中央文革，让文革小组点头我们才去做。所以，从我们来说，从我们总部几个人来说，依赖性上也是大增强了。而自己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想办法和我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实际上，在我们思想上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奴隶主义思想。

2、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揪出刘邓路线的执行者和顽固的坚持刘邓路线的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挖掉刘邓路线的根子，这点是本质的根本的东西。因此，在怎么样批判刘邓路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感到应该两个方面，一方面召开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召开的，但是呢，这样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不应过多，当时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这个十万人大会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排得很满，工人体育场一排排上了半个月以后，都满了。我们认为这个大会开多了没有什么好处。开这种大会，花的精力是相当大的，每个筹备这样的大会的人，是很紧张的，忙得要死。而参加大会的人呢？这些群众大部分的都闲着，处于很空闲地位。他们参加这个大会听听发言，呼呼口号，有的呢，为了去看看首长，有的是为了去看看黑帮，这样大会对广大群众教育意义并不十分大的。我们认为这种大会是造声势的一种方式，是批判刘邓路线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不是重要的方式，应该是次要的方式，而主要的方式，应该是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扫它的社会基础，这是主要的。这个社会基础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各个基层一些刘邓路线的追随者，一些顽固的坚持者，要揪出这样一些人物，和他们进行斗争，进行批判。但是，当时在北京市的各个学校，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比如北航红旗，他们的工作队就没开过一次批判会，他们学校里面黑帮也没斗过，这是在13期社论发表以后，而他们老是热衷于开这个大会，开那个大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挖掉我们每个人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而这一点应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当时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往前推进一步，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工人运动，革命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当时提倡大批下工厂、下农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另外我们当时发现了工厂形势很紧张，斗争很激烈，需要革命知识分子打先锋，可是，我们发现了在知识分子里边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倾向，就感到必须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比较坚持这个方法，就是大批的下工厂下农村，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挖掉刘邓路线，挖掉修正主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子，才能把我们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在批判刘邓路线上我们的看法。

3、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在红旗13期社论发表以后，揪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一个黑帮分子，揪出一个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比红旗13期社论发表以前要容易得多。当然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红旗13期社论的发表说明了以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揪这些人比较轻松，大家觉悟都高了，比较轻松，比较容易察觉，保守派力量小了，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感到中央文革小组过早地定了调子，对某些人物过早地定了调调，有些人刚刚被揪，刚刚出现了几张大标语，要揪他出来，而另一派正是处在死保的时候，两派一个是保一个是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该让群众在斗争中分辨那一方面是正确的，那一方面是错误的。应该让群众充分辩论透，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到底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中央文革这样太早的下结论，中央文革一点名，说这个是，那大家都去揪，而大家马上都倒过去了，都要去揪他了，而中央文革说不是，那么大家都不去揪他了，这样的话，群众受到的教育就比较小。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咱们揪出何长工揪出邹花了多大的斗争代价，多少人流汗流血，甚至有个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我们很多参加过斗争的同志都认识到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深深体会到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群众有好处，使我们在斗争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在13期社论发表以后，这个形势就基本上没有，而是一揪基本上一揪，中央文革就说，这个人是或者不是，是么，大家就一起来斗，不是大家就放掉了。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过早地定了调调，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后来呢，有作法，有人，那基本上群众就没揪，文革小组就点名点出来了，这样更加不利于教育群众。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达到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使群众在斗争当中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要群众真正来掌握毛泽东思想，要毛泽东思想在我们每个人头脑里扎下根子，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要这样将来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有人能起来造反，中国就不会改变颜色，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目的，假如这一点达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揪出那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刘邓路线的推行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部分，比较本质的一部分就是我前边说的东西，而我们认为文革小组在那阶段的作法是偏重于把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把刘邓路线的推行者和顽固执行者揪出来，而对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让群众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支鉴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让群众通过斗争来掌握马列主义，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真正在群众的头脑中扎下根子，彻底挖掉每一个人头脑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文革小组注意的不够，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注意不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这样一个看法。所以在以后揪一些人中出现了一些很被动的局面，今天文革说保的，过了一天又说把他揪出来了，造成了很多被动场面，随着两长路线斗争的深入，在去年12月份刮起了一股黑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黑风，这股黑风当时留在北京的人大家都知道，都能回忆得起来。这场风，这股黑风的来势是相当猛烈的。关于揪和保的问题，同志们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周荣鑫的问题，基本上群众没有揪，直接是点了名，然后大家一起抓出来去斗的；关于肖华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多被动，陶铸的问题也出现争执，开始有些单位揪，总理又保，保了以后，大家又都不揪了，后来文革又点了名。大家又一起去揪把他揪出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何必去保，我记得陈伯达同志作了一报告，在报告里讲了这样一句话，（老农妇）有个农村的老太太讲了一句话，她说你是马列主义者，你还要保什么呢？我感到这句话讲的很有道理，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去年12月份就刮起了这股黑风，在反击这股黑风过程当中，有些作法我有不同看法，根据16条（我说这些看法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想法）的规定，凡是杀人、放毒、放火破坏盗窃

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这种人要加以逮捕法办，对这种人必须逮捕法办，非如此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当时对于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对这样的一些人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中间有人讲问题）是弊大于利，好处少，坏处多。我们当时是这样的看法。比如说，李洪山的问题，我们认为李洪山是现行反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认为像李洪山，不要把李送到监狱去，要把李洪山放在群众当中，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当个反面教员，这样就教育了群众，将有很大好处。相反，当时李洪山在学校斗争了一次以后，就送到公安部，在公安部以后基本上没有人再把他弄回来斗争他，所以，李洪山的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并没有批倒批臭。这样是不利于教育广大群众的。对于谭立夫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主席也说过一个学校出几个蒋介石分子没关系嘛，做反面教员嘛！何必先把他抓起来，可以摆在身边，也可以跟他辩论，叫他摆摆蒋介石到底有什么好处，蒋介石到底怎么好，把他批倒批臭，这个好嘛！另外，对科大雄师问题，科技大学雄师战斗队的文章不知同志们看过没有，他在这里边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也确实他的立场是站错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但是，对科大雄师这些头头是抓了好还是不好？我们认为还是不抓好，因为他们反革命理论在科技大学并没有被批判，相反还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看法。另外像对待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方面，哈军工造反团是全国有名的左派队伍，他们几个头头给中央文革贴了两张大字报，后来两个头头被抓起来了，送到监狱去了。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也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认为这种作法压制了群众，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方式不对，应该批评的，但是抓到监狱去，对群众当中发表不同意见是没有妨碍的，实际上他们这种思想，哈军工写了大字报的思想，在很多左派队伍中有所反映，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感到文革小组在一定的程度上或者说各更准确一些就是在运动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压制群众的现象。文革小组呢？在这个问题上作法我们是有不同看法，因为我们认为在贯彻执行政治路线方面文革小组没有能够坚决的贯彻以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当时的观点。

4、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在去年10月中旬和11月初的时候，随着斗争形势发展，当时我们深深感到有必要逐步实现全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而且第一步就是统一三个司令部，把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首先在学生中联合起来，本着这个想法，我们就和北航红旗、政法公社、建工八一团等三个司令部的一些学校，一些左派队伍建立了一个联络站，在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想以此逐步统一三个司令部。但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同志知道这事以后，批评了我们，当时关说：你们那样做会把三司挤垮，这样，就会影响到中央文革，我们不希望三司垮，我们不希望你们垮，你们也不希望我们垮，要是革命搞不好的话，不仅是你们要打成反革命，我们也要被打成反革命。当时，他很严肃，这个造反联络站我们搞了一半就没搞下去，后来就散伙了，而在三司里面有学校，在三司一部分组织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当时就给我加上了分裂主义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想不通的，实际当时的三司，13期社论发表以后，经过一个很快的大发展，由于组织发展工作上的问题，不严密，由于原来的二十几个学校一下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实际上三司里边也有组织已经不是革命派的组织，混进来的，当时必须重新整顿左派队伍，重新纠集左派队员，重新组织左派队伍，当时我们对这一作法我们是想不通的，说过关锋同志在处理三司这个问题上面，在对待三司这个问题上面采取了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关于这次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我们讨论过它的深远意义，我们完全赞成大联合大夺权，当时在一些具体作法上面，我们是有一定的看法：第一关于大夺权，大夺权必须有大联合作为前提，否则很多政权将被保皇派保守派夺权，同时还可能引起革命派队伍内的互相冲突，这样来搞乱革命派的阵营。第二个问题，大夺权必须利用和依靠那些好的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打倒。当时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凡是当权派都要打倒，在夺权过程中，我们认为黑帮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犯有路线性错误这里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已认识到错误的人要加以区别，不应该一样夺他们的权，在夺权中也不应该出现一些戴高帽子呀！游街呀，挂黑牌子呀，等等这些现象，我们当时是有意见的。第三个问题是北京的大联

合不能一哈而成，必须有个过程，为什么道理呢？有这样几个原因：1、因联合的主体以工人、农民，而这个主体在北京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有他的先天不足性，这个先天不足性一方面北京市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就是比较差，北京的产业工人很少，2、由于北京长期以来受了彭真黑帮的统治，受压迫、受压制得很厉害，一般的运动有多次的反复，所以工人一定不敢说话，所以北京市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起来比较晚的，而北京市的工人运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北京的工人运动，他的几个总部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有工人造反总部，还有个造反联络站。这几个总部是怎么成立的呢？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这一批人搞总部的这一批人在工人运动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他们最先跳了出来，这些人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人，另外一批人有些人确实确实是彭真黑帮的小爪牙，被打成反革命的，而这些人呢？他们趁着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站了出来，而跳了起来，跳起来以后，他们首先就弄了一个大印，什么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或者革命造反总部，搞一个大印，然后呢，到市委、总工会或到市里去要它几间房子，就打起了招牌。然后，他们分头到各个工厂去发展他们的实力，招兵买马，也不管那些工人是什么态度，反正他们下去就发展实力，招兵买马。这样使北京市工人运动大联合本身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致命的弱点。所以，北京市全市性的大联合要是以工人为主体的话，是必要抛开几个工人总部，从基层做起。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另外，北京农民运动起来是比较缓慢的，也有个别的几个地方起来了。第三，北京市的学生运动由于出去串联的时间比较长，北京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方面工作是比较差的。现在学生运动当中出现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弱点，本位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些现象就比较严重，所以北京市的联合有一定困难的。第四个就是北京市没有像上海和其他地方那样，经过了一个全市的大搏斗，北京没有，你比如说，上海有两派势力，就是一派要攻市委，一派要保市委，在这个斗争过程自然形成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和保守派的大联合，在斗争中本身就形成了这样的联合，其他城市也有这种情况，攻击这个省委或攻击这个市委，一个保这个省委，一个保这个市委，自然而然形成了两派力量的大联合。在北京没有这个斗争，没有这个全市性的大搏斗，也没有一个全市性的共同目标。所以，北京市的大联合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这个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个联合过程中，决不能搞合二而一，决不能搞调和主义，折衷主义和抹稀泥。这就是我们当时对大联合的态度和大夺权的态度。

5、第五个问题，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北京中学生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初期起到一个闯将的作用，尤其在破四旧当中的的确确是一个闯将，但是，后来北京市的中学运动冷落下去了呢？为什么这些小闯将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联动的成员呢？而其中有些很著名的闯将为什么进了监狱呢？这个问题我是考虑了一番，我经过了一些调查研究，跟一些中学生，很多类型的中学生进行了一些接触，我们认为在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矛盾的焦点就是关于对联问题，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对联问题，这就是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关键问题，一个矛盾的焦点，集中在这点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这个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就好，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没有解决好，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处理好，这是矛盾的焦点。我们认为这个对联在初期出现的时候，是有它的一定的作用，尤其对北京这具体地点来说，北京长期在彭真修正主义统治下，他搞了一套资产阶级路线，修正主义阶级路线，歪曲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的强调重在表现。所以，当时中学里出现这副对联，在初期是有一定意义的，就可横扫一下这条修正主义的阶级路线，这个初期就必须大讲阶级分析、阶级出身，非如此就不足以打倒修正主义阶级路线，非如此，就不能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所以这一段是需要的，但是这一段不能太长，到了一定时期就必须扭转，必须指出这副对联的局限性。我们认为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初期对这个对联的支持是应该的。但是，在此以后，对中学生，从中央文革小组来看，对中学生的引导教育是不够的，尤其在这个对联问题上，因而对联就逐渐被敌人利用，这就是被西纠发展成了反动的血统论，而在这段情况下，一些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对待中学生这部分力量不是采取了说服

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武力解决，采取了压服的方法，忽略了作思想和分化瓦解工作，特别是后来对联动的态度尤其这样。这里可以举例子，例如清华井冈山抄人大附中红卫兵时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知道不大确切），据说把小孩赶到楼上去，赶到楼顶上，一层层追，追到楼顶上，人大附中红卫兵小孩给打的只剩下六七个了，在楼顶上他们升起了国旗，用瓦片砖头打下来，一面高唱国际歌。另外，在抄石油附中红卫兵家时，红卫兵他们打打，退到地下室里边，他们就把地下室里边放了水，说：“你们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就继续放水！”还有用灭火机向小孩脸上喷，说：“你投降不投降？”“不投降再喷！”这办法，我们认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原来西纠是采取这个办法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办法又对付他们。这些小孩嘛！才十几岁嘛！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嘛！在这些群众组织对这些小孩、中学生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所以有小孩，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第一个红卫兵嘛，毛主席不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吗？他们一看到那封信就抱头大哭，对着毛主席那封信大哭。另外，我个人有这样看法，江青同志在对待这些中学红卫兵里面，有些做法是不够妥当的，在初期的时候，比较爱得过火了一点，宠得过火了一点，就称他们“小太阳！中国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啊！在后期关心教育不够。联动的小孩在监狱中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没记清楚，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过去江青阿姨最爱我，我给阿姨选沙果，现在若问送果人，身穿囚衣当俘虏。”现在在一些中学里面，在一些窗子上和门上都写了“小太阳坐牢房”这种标语。在监狱里，一般晚上就唱那个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里想念毛泽东。”有十多岁的有些十多岁的小孩也被抓去，当政治犯抓去，只有十多岁，十岁刚出头，十二三岁就当作政治犯抓去，这都是群众性的组织抓去送去的，关在监狱里边，许多联动的小孩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口号，压的不服嘛，他们提出这样一些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战斗队，他战斗队的名字就叫“活着干，死了算”，还有人呢，很多和家庭断绝关系，自己单独干。（以上根据录音记录稿，以下根据笔记记录稿——刻印者按）联动已认识大方向错了，对三司有意见，希望文革（小组）谈一谈，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争取了一些西纠派。现在联动有三万多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小孩写红卫兵日夜想念毛主席，应关心他们，联动是反动的，但他有免疫力，并且可能成为左派队伍。

6、关于坐牢问题。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他的两个头头写了两张大字报，被抓了，我们就准备坐监狱，我们想，主席、林彪知道了才能平反。

7、聂元梓问题。新北大初期，对全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七月底为什么转而反了我院和北航红旗？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在北大辩论工作队问题时，过早地定了调子，队伍未分化好，造反派，保守派未区分开。聂元梓有很大功劳，但批判工作队时未发挥她的作用。她是有很大大政治影响的人物，如果聂带头反工作队，工作队是站不住脚的。聂元梓与王任重是未划清界线的，对王任重的反动路线未抵制，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有错误。群众批聂，聂应检查，但聂老虎屁股摸不得，中央文革定聂是革命左派，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另一事实是，有一派，死保工作队，后又死保聂。红旗公社，北京公社成了堂堂大左派，被工作队打成右派的人还未翻身。

8、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年青人与工人反对林杰、关锋、康生，而一些老干部保。年青人造反精神好，老年人保守，我们派人去了解过，但没有参加“调查康生问题委员会”。

二、我的思想过程

从大串联后逐渐形成，到12月黑风，大联合、大夺权，我认为是正确的。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有赶快结束运动的想法，准备打大战。我们不想出大字报，如果不是要打仗，我们就有如下打算，就打了一些电话，要求中央文革单独接见。第二，打算印传单，写大字报，但

王大宾不同意。我认为，这是根本办法，当前许多群众不动脑筋，要更深入发动群众，大家都能起来造反，影响大，可能要将运动推迟五个月。因为主席说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我们想法请求军委谈谈国际形势，因为没谈，也未写成。大字报只起了个头，开始题目叫：“我们要造反了”。第二次题目改成“东方红总部造反声明”。并没有写完，是表态性质的。内容主要是我们要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

我们没有给中央文革写过信，当时想，这个大字报出了以后，影响会很大，“保字号”会乘机造中央文革的反，我们还要保中央文革。

伯达批示下来后，我认为比薄一波的批示还厉害，什么也没干，糊里糊涂打成反革命。晚上开会也没去，发展到与中央文革对抗的地步。思想上产生抵触情绪。蒋良朴说：“这个批示比万吨水压机还重。”

三、我的错误实质与危害性

1、我把自己仅作为革命动力，而未作为革命对象。没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阶段，错误认识了大民主与无产阶级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2、大字报、传单问题，虽然有好愿望，但客观上帮助了错误路线和敌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没出来，影响还小，否则，影响更大。

3、长期以来脱离群众，由不相信群众到害怕群众，不能把思想露给群众，而两次避开群众。放弃了总部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当前工作。

4、我的错误影响了“东方红”的威望，使我们的战士遭到保守派的围攻，遭受毒打、游街。使受东方红支持的左派组织遭到保守派的反扑。

5、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6、在整风中，我们强调抓一小撮，抓托派，提法不恰当，是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压制了群众。把一些同志当成托派，感情上与同志们对立。在此，向“东方红”战士承认错误。

7、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对错误认识是缓慢的，态度是很不好的。欢迎战友们提出诚恳批评。

—完—

□ 原载张运钧、李颖编《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劫后反思】

造反与造神：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的思考

• 吴祚来 •

一、“造反”与颠覆，是中国革命的主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者在发起之时，就已然对这场运动进行了“定性”：参与主体是无产阶级（红卫兵是新生的无产阶级，他们一无所有），性质是革命（革命即“造反”），主要领域是文化（实为心灵革命或灵魂领域的革命）。而宣布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官方，认为这是一次决策“错误”，发起人是毛泽东，主要责任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后果是“十年动乱”。

本文想从人类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历史、以及文革过程，对这场运动进行分析与定性，本作者的分析基于这样一个逻辑来定性：结了桃子的树，可以定性为桃树，即便它是由梨树嫁接而成，最终的结果决定一棵树的被定性。

文革这棵其大无比的树，结了无数恶果，但最大的恶果，就是造了一尊神，以太阳为形象符号（“东方红、太阳升”），以伟大为体征，以万岁为呼号，以其思想、语录为教义，以开天辟地为其新创世神话，同时他也像宗教领域的救世主：“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马克思倡导的革命被毛泽东等人做成了中国特色的造反，主要原因是中国在1840年之后，在面对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之时，没有像日本那样完成政制改革，日本的明治立宪使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政制文明与技术文明、学术思想，从而变成一个强大的近代国家，自上而下地完成了维新，而不是通过革命或造反的方式。

相比之下百年中国，所有的领域都进行过革命，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革命或被革命，唯有当政党与最高领导人，没有实现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共最高领导人无法自我革命）。中共开启的模式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与造反，新文化运动是先声，五四运动开启了暴力模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革命与造反有理的“福音”，湖南农民运动是底层社会的一次社会大革命，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文革的方式：通过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分裂人民为不同阶级，组织农会甚至农民武装，通过阶级斗争剥夺地主土地与财富，非法进行人身迫害，为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为建设中共的“新中国”做准备。

延安整风与延安文艺运动，是中共对党内知识分子与异己者进行的一场扩大化整肃，也是一场小规模的文化革命，迫使文化为中共的政治服务，歌剧《白毛女》是八个样板戏的鼻祖，丑化、罪化地主阶级，制造阶级仇恨，为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做准备。《东方红》歌曲在延安唱起，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提出，造神运动已具雏形。

延安确立毛泽东的党内至尊地位之后，中共夺取了国家政权，立即开启了继续革命的模式，而在传统中国，用天道模式打得天下之后，立即开启人道模式，遵守仁政道德原则来安定天下，中共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反人道进行革命运动。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的运动，三反五反等等，都是制造革命恐怖，致力于迫害人权消灭异己者甚至无辜者的生命。而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则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时进行的文化革命是从反右到庐山会议，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迫害，对党内异己的清除，毛泽东成功摆脱了三年灾害的罪责，又一次确立党内至尊地位。

直到1966年新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被发动，我们看到，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导的革命与造反、颠覆几乎每十年进行一次。

湖南等地农民运动，颠覆了传统中国社会模式，这是一次底层威权与秩序的破坏与颠覆；

延安整风与延安文艺运动，国共内战，颠覆了国民党政权。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颠覆。

第三次颠覆是五十年代，废止全国政协的独立政治权利，迫害民主党派与知识精英，使共和国成为党国。

第四次颠覆是继续迫害党内异己，并大量迫害知识精英，颠覆共产党政权，成立革命委员会，造神运动获得成功。

而最终形成的颠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所谓秦始皇加马克思，实为举着马克思的旗帜，行着秦皇暴政。毛泽东其反人道、侵人权、奴役与欺骗人民，恢复的是超越帝制的极权，形成的是红色革命政教合一的党国体制。党国全部占有了国民的剩余价值，甚至私有财产。

从一切权利归农会，到农民成立武装组织，到红军变成党的军队（党组织建在连队上）、党指挥枪，党指挥枪，军队成了党卫军，国家最终异变为党国，党内毛泽东指挥枪，枪最终指挥了党，枪杆子制造了个人极权，并成功实现了个人的神化。

文革实现了毛泽东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人神，成为精神领袖，成为万岁，他不能从血亲上实现政权的万世一系，但可以实现思想万岁，致力于红色基因的万世一系。

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每十年毛氏都会启动一次政治文化运动，每一次运动的结果，都让毛的地位升级一次，直到成为中共的一尊神圣。

二、“文革”：过程与结果，都是一种宗教状态

触及心灵、灵魂的是人类最高价值，但它可能会使人产生宗教情感、精神迷狂，古希腊人所言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前者使人迷狂，后者让人崇拜。毛泽东穷尽自己在中国的政权最高权力地位之后，在人类的思想巅峰上，最终实现的是思想万岁、形象万岁，就是达到人神或偶像神的位置。这不仅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而是耶稣、天皇、教皇、皇帝、革命领袖、舵手、思想家、革命导师、统帅这样的崇高伟大元素的集合体。

“东方红太阳升”，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歌词，它在中共的红色宗教情境中，如同基督教中的那句：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中国历史一直黑暗，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大救星，如同太阳升起，中国便有了光明。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们（安徽怀宁）村庄的一位年迈老人广播里听到毛逝世的消息，泪流不止，她说，为什么死的不是自己，她愿意为毛而死。

同一个时间，安徽皖南（绩溪县）田野里，生产队农民在田间劳作，突然，从村庄那边疾跑来一位老地主，他边奔跑边疯狂地高喊：你们的主席死了，你们的主席死了。

声音响彻南方的原野天空。

这个时间应该是下午四点左右。

我当时读初中二年级，被通知全体同学坐在教室里，收听重要通知，当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哀乐阵阵传来，我的内心并没有悲哀，只有莫名的惶恐，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们又被极左的教导主任集中到学校的院落里，听他诉说悲痛，他掏出手帕擦拭眼泪时，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同学回过头来，对我微微一笑，他的笑化解了我受到的现场情境感染，我内心瞬间有了某种轻松。太阳正在西沉，当时我突然在想，这轮灰黄的太阳将会怎么样？（这是当时真实的个人体验，所以记忆深刻）

一个人去世了，一个党国领导人去世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居然会对永恒的太阳产生莫名的焦虑，有一份惶恐不安。因为我们失去了一种宗教关怀，实为一种邪教的虚假关怀。

对于一位地主，压抑他的魔王死掉了，他解脱了，或者说精神上获得了一次胜利，那个人并没有万岁，他自然死亡了。

老地主似乎在呼喊：你们的主席死掉了，你们没有主席了，你们没有保护神了，你们怎么办？而对于一个中学生，是一直被宣传的像太阳一样光辉、伟大的神一样的领袖突然没有了，这不符合逻辑，因为他已被塑造太阳一样的形象，生命将万岁永远。

我们有多少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歌儿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后来，我进入教堂，才知道，那些美妙绝伦的颂歌，应该是信众们献给神的，但那个时代，这些颂神一样的歌曲，全部都是用来歌颂一位独裁者的。

2011年重庆，我去亲身体验闻名一时的红歌广场，听到了这首：《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多少年没有听过，突然听到来自年少时的颂歌，无比真诚无比喜悦，突然又复活了一种宗教情感。我是多么希望这首歌献给一位真正的神或英雄，因为这首歌让我的灵魂有了皈依，内心因信仰而温暖感恩，但理性告诉我，这是一场巨大的骗局，有人披着神的外衣，公然把全中国的人欺骗。一时间的感觉是：情感在复活，惺惺在作呕。

我们对一棵树的定性，是这棵树最终结了什么果实。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也应该看它最终结了怎样的恶果，最大的恶果，就是通过政治、文化、造反、斗争，迫害、恐怖方式，造了一尊邪恶神，借助了太阳的光辉。通过编造神话“东方红”史诗、通过无数改编的颂歌、通过圣经一样的语录出版、学习与教材背诵，通过一切的方式，通过一切人，还甚至通过向海外传播，塑造了一尊红色邪神。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幽灵，终于以肉身的方式呈现在东方大地，肉身之人却被呼喊万岁，万万岁，最终却像所有人类一样，死生由命。

文革结束，国家成为废墟，只有一尊神仍然在神圣矗立。

毛泽东走下了神坛？

他的画像仍然悬挂于国家象征之门，他的思想仍然是国家指导思想，战无不胜的毛思想万岁，仍然写在新华门前，人不能成为神了，但他的思想他的灵魂却成为神一样的存在，继续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网络上有无数的毛迷，村庄里残留着无数原有的毛画像，现在新的画像又在重印，并配上新的领导人形象，大城市出租司机曾时兴挂毛像章辟邪，而民间农村，更是如此，民间社会的人偶神现象，通过毛形象大量出现。

因为没有完成近代化，没有进入政治文明现代化，所以中国无法走出文化大革命陷阱：当年一隅重庆，文革之风如火如荼，人们仍然会在情感上去依赖神一样伟大的领袖，靠着他们为人民谋幸福。

而现在，当年重庆的放大版又一次上演，又一位伟大领袖要指点江山，既有马克思一样的新思想，又为党国未来描绘蓝图，他遍读人类名著经典，他的讲话是新时代伟大思想，他的思想被写入党章，并成为数以百项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拥有最高权力者，即拥有神圣不可怀疑的思想，这就是政教合一，这就是重建神圣信仰，这就是文革再现，最终还是一场造神运动，结出一枚邪恶的果实，让整个国家民族自受其恶。

文革只有一个结果：国家成为废墟，只有一尊神矗立。

三、对比明治维新，看中国百年革命

“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以它是中国百年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百年中国革命的收官之作，最后的巅峰。因为文革之时中共已完成了制度革命、土地革命，而文化革命是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也是心灵革命，已触及到灵魂层面的革命，所以它是革命的极致，进入到革命宗教状态。

如果对比明治维新，会发现，中共的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逻辑的产物，符合中共的真理与历史逻辑，同时陷入死胡同，就是不仅要与人类的私有制进行革命，还要进入人类心灵，进行革命。为什么中共会陷入这样的死结？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在应该完成近代化的时间，完成近代化，在应该完成现代化的时间，完成现代化，社会与政治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路径是以政制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带动社会的近代化与现代化。

西方世界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过程是渐进的过程，是主动因变的过程，或者说西方是主导世界近代化与现代化的领导者，而大清中国与邻国日本，则是应变应急过程中，被迫的近代化。

近代化一词对中国与日本独具独特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国门被迫洞开、市场面向全球、国家必须改变政制以应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化（民主化）、工业化、市场化，通过军国主义来保障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近代世界生存法则（东方近代军国主义是西方列强激发出来的）。

日本明治维新以东方文明特殊方式，完成了政制改革，幕府大政奉还给天皇，天皇主导宪政改制，学习西方、工业化、天皇主导的民主化、资本主义市场化、富国强兵、文化与农村通过改良方式，随之实现近代化。而中国在明治维新之时，有同治维新（维新变法），又有君主立宪，均是表象之作或无法完成社会转型，终结大清之后，或因军阀混战、外力干预、国共北伐、日本入侵与苏俄渗透建立红色政权，使大清之后的中国，尽管已经进入到近代化进程之中，但一直无法完成政治近代化或者一直被破坏。中国至今仍然走在近代化的路上（有工业化进程而无世界认可的市场化），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

政治近代化与现代化之后，农村土地问题、文化习俗问题、信仰问题，通过自由与市场去完成，或通过政制去调节，完全不用革命与颠覆的方式去完成。正是因为无法政治近代化，所以才有清末与民初的各种乱象，正是因为无法完成政治现代化，所以中共一直通过社会颠覆的方式，一次次去解决一党专政无法解决的问题。

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中共解决社会问题的特有方式，就是底层无产者或流氓无知者们，对有序社会与不公社会进行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颠覆（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只采取革命暴力），迫害人权，毁灭传统与契约，法则，最高教主或动乱的制造者却坐收天下与红利，比较一下日本明治维新初十年，有近二百次农民起义，但精英们没有去发动底层革命，明治维新也没有革命性地去剥夺底层地主的土地，原有的社会精英则融入新的政制行政系列中，转型成为新生的力量。

有趣的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天皇神圣性的复归，某种意义上，明治维新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天皇之下人人平权，文革之时毛神之下，人人平等，日本的近代人人平权，有宪法保护，而毛神之下人人平等，只靠毛语录的造反方式来实现），而这使日本获得了近代军国主义的精神力量或宗教力量，如果仅有西方的政制，而没有东方特有的政教合一的力量，包括武士精神、效忠精神、家国一体，日本近代不可能战胜大清与俄罗斯，也不可能在二战时与美国在东亚进行决战。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被征服的日本政治转型，完成了现代化，天皇成为国家象征，不再政教合一，变成和平正常的民主宪政国家。西方政制与东方文化传统，美妙的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毛泽东的军国主义只是在朝战争、以及对台湾、对越南、对苏联进行过有限的战争的话，它更多的是对内军国主义，对外是革命输出模式。而反思当今的中共新文革，南海造岛与一带一路，既在致力于重建军国主义模式，又在通过经济殖民经营的方式，隐藏意识形态与党国影响力的输出，现在在积蓄实力、扩张地盘，以空间换时间，只要时机成熟，必然展开正面对抗（所谓“以牙还牙”）。庞大的红色党国，不能进步到宪政民主状态，必然要退回到军国状态，对外害怕敌对国家颠覆，对内担心各种力量结盟颠覆，对内是党国对外必然是军国，以保障政权的安全。而元首人物的神圣化，也是为了政治安全，或者它是极权政治的最高形态。

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漫长的近代文化革命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思想勃兴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原生态文化思想，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圣哲创造了字概念：仁、义、礼、智、信、道、德、忠、诚、福等等，这些文字体现传统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

而日本文化的近代化过程，通过翻译与利用传统中国文字，创造了词概念：维新、大政奉还、神武、物理、武士道、文明、开化、厚生等词是利用传统中国文化，旧词新用，但更多的概念则完全是日本近世创造或翻译时的创造：社会主义、共产党，干部、封建社会、观念、理想、主义——我们今天中国使用的绝大多数近现代语汇，均来自日本近世创造。而近代语汇，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近代思维、近代价值观，语言文字中隐藏着一个文化民族的心灵内含。

日本人并没有发起一场宏大的群众文化运动，而是一个个学者按照实际需要，来完成了这样一件文化升级，它不是一次运动，更不是一次革命，而儒释道文化精神仍然潜在地影响着日本人的心性，东方文化的底蕴没有被革命性消除，尽管明治维新之初，也有激烈的争

论，关于汉字、儒文化的落后性，甚至人种低劣论，都有争论，但一旦主流社会主导的政制改革开启，随后的文化问题就变成一个纯个人的自由选择、自发创造的问题。

汉武帝之后，儒家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所以古代传统封闭的社会结束之后，必然要有新的文化思想以适应新的近代社会、面向开放的世界。日本明治维新也一样，佛教的国教地位废止，天皇的神圣性确立，书院教育中的儒家经典让位于兰学、洋学，大量的西方经典文献被翻译出版。

兰学与西学给日本的是筋骨架构，以及新的政治价值体系与行政管理方式，但其文化血脉与文化元素，仍然是东方传统或者萃取了华夏文明文化基因。

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新文化运动则走了极端：1919年1月15日，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错误表现在：社会精英们过多的关注文化问题而缺少对宪政民主制度的启蒙与研究，特别是宪章的普及奠定，激进的共产党人在政制革命、宪章宪政领域几乎一无贡献，追求的只是革命与颠覆、造反与斗争。

其二，用革命的方式而是不扬弃的方式，将传统道德与非人性的礼教完全等同，废弃传统道义，导致中国近世社会日趋流氓化、暴力化。德先生与赛先生，解决不了儒释道先生心灵层次的问题。脱掉儒家的长袍，却又无法制作西人的西服，所以国人在道德领域只能裸奔。反传统导致流氓文化成为近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流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群氓被理论包装，并加以科学化、革命化、赤化。大量涌现的革命理论符号，如同陌生的病毒，中国普众无法抗拒，从大脑到躯体，均被侵蚀，成为红色革命病毒的牺牲者或病毒感染者、传播者。

其三：学生与社会底层的人成为运动的主体，学生们更多的是理想激情代替理性与现实，而后来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几乎影响了整个百年中国历史进程，学生的爱国与热情都可歌可泣，问题是成人主流社会没有成为主力，而成熟的文明体中，无论是英国大宪章还是美国的宪政制度确立，甚至黑人争取平权运动，都是成人主导，精英主导，而不是靠热血激情的学生运动来争取。

其四，五四运动开启了学生暴力正义，前有打倒孔家店，后有火烧赵家楼，因为有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打倒孔家店，到了文革之时，就会有毁孔庙孔林，毁坏无数古代文物的悲剧发生。毁灭私人府宅在中共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革抄家，更是成为风行的方式。

第五、革命精英们用更革命更激烈的方式，对中国社会与政治、文化与经济进行颠覆性的毁坏，而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更是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革命成为宗教，马克思主义成为教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因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而登上历史舞台。而陈独秀、李大钊们，正是毛泽东的革命导师、带路人。

陈独秀这些导师们即便进行革命，还是有一定的底线，而到了毛泽东一代，无底线的革命，利用流氓进行革命，暴力革命，迫害人权的革命成为主流。

后来呢，共产党人拥戴的不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了，而是马列先生，而到了文革之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被神圣化，成为唯一被拥戴的对象，陈独秀们所有的革命性毁坏，只是为了树立德先生与赛先生，而文革之时的所有破坏与迫害，最终是为了树立毛泽东个人的神圣地位。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距半个世纪，却与毛泽东的文革，形成精神上的链接、呼应关系。

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什么呢？反礼教，兴政教，政治启蒙与政治教育成为潮流：政治教育并没有致力于进行政制改革，而是致力于颠覆传统文化传统信仰，而礼制一方面禁锢了社会自由，另一方面，却是维系社会和平的一种道德力量，对比日本明治维新我们会发现，日本维新方式不是革命造反的方式，而是扬弃的方式，道德价值元素被肯定，社会通过新的政制完成平等与自由、开放。日本的精英成为主导社会变革的主力，学生与农民，并没有被精英们煽动起来，而中国的学生们用青春的热血与激情，在中共的领导下破坏一个旧世界，但却无力建设一个新政制，特别是新道德体系。

德先生与赛先生不可能建立起道德价值体系，特别是民间社会的价值体系，这两位先生神圣地位还没有确立，另两位先生急促进入中国，就是马克思、列宁，或者说马恩列斯主义，革命就是造反，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是真理，五四运动开启的，是学生运动，是工人罢工，是反帝反“封建”，这些都是口号，在当时改变了一定的时局，但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在中国，群魔邪恶同时涌现，它以光明与希望之神的面目出现，但百年来人们遭遇的却是黑暗与绝望之魔。

爱国、反帝也会进入迷狂状态，反传统，还是进入迷狂状态。这些都是革命教的表现，因为爱国、反帝、反“封建礼教”都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神圣不可侵犯，谁反对中共的政治正确，就是反革命。

陈独秀、毛泽东在中共随后的纪念五四活动的同时，纪念五五，即马克思诞辰，马克思成为革命神圣的符号。中国近代政治启蒙的开始了大转型，而这一转型，是文化革命向政治革命转型，是革命宗教取代传统的社会道德。极端化、暴力化、革命化成为新总体特征。

所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门。播种了革命的种子、选择了红色转基因。政治成为新宗教，它也有排异排它性，需要独尊马术，罢黜百家。新文化运动本应该是新启蒙、文艺复兴运动，因五四救亡图存，而演变成为新政治宗教运动、革命造反运动。这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救亡异变了启蒙，使启蒙变成了革命启蒙与造反宣传、暴力煽动、侵犯人权、颠覆国家。

五、湖南农民运动，从底层开启的颠覆模式，侵犯人权成为革命常态

湖南农民运动，是从社会最底层进行一场深刻的历史性的社会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毛泽东还只是学生状态的话（毛泽东说陈独秀是自己的革命导师），而到了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之时，毛泽东则升格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理论指导者与总结者，而这一切为日后毛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实践基础。

我们摘取两段《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立足地位，完全剥夺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垄）。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战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去，复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出到他们的嘴巴。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之时政治口号满天飞。通过口号打击敌人、打击政治异己，毛泽东二十年代在湖南就深谙其巨大的精神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宏大口号，与具体的财产剥夺、人权侵犯，如此协调在一起，这是毛氏革命的法宝，分裂人民，制造革命狂欢，让底层的群氓通过革命获得精神力量，并融进革命队伍，成为革命战士或牺牲品。

通过打土豪乡绅，最重要的是获得了革命经费、革命人力资源，而让流氓无产者与热血青年通过革命获得成就感、精神渲泄、扬眉吐气，这是通过迫害阶级敌人获得的，共产党不用任何成本，就收获了异变的民心。而这也是后来文革的手法，毛泽东几乎不需要党国支付成本，就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共现在新造文革的成本却代价巨大）。

从大清向民国政府转型之时，地方农村出现行政权力真空，毛泽东共产党成功利用农村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与贫富悬殊等问题，以及传统礼教对人性的压抑，进行政治宣传，并发动了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到了农村，成了中共的文化宣传运动。湖南农民运动时，基层组织是农会，农会权力决定一切，而到了文革，则是革委会，革委会取代了党和政府组织，权力高于一切。

早期毛泽东与晚年毛泽东，都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新的权力体系，破坏社会伦理与法律，秩序与规则，通过恐怖与迫害，整肃异己，以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最终完成革命运动造神。

湖南农民运动让中共得到了工农红军，得到了革命经费，得到了底层民心，培养了干部队伍，得到了破坏底层社会的经验，而这一经验模式在后来的国统区、抗日战争大后方继续使用，为最终战胜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中共革命是为了共产主义，所以，中共的战争又具有宗教性质，宗教性质的战争不仅无成本，而且更多的力量是基于奉献与牺牲而进行。通过中共不断的宣传塑造，毛氏进而扮演了革命战争教主的角色，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实为一句宗教性质的宣传（因为只有神才会战无不胜）。

六、延安的“文化小革命”到庐山会议

延安的政治文化运动，即党化文艺（中共并没有如此命名，但实质是进行了一场内部文化革命），延安的文化革命，是革谁的命？是打压进入延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的自由化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对延安的批评，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要求的是个人身体的自由与个性思想的解放。进入延安的新文艺人士不认同毛泽东的想法，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萧军语）。

毛泽东无法容忍自由化思想，康生、王震、贺龙等均表达了严重不满，王实味1942年2月在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大胆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暗面，遭到几个月的批判斗争、隔离，第二年一月被康生下令逮捕，关进监狱，后被砍头。

毛泽东要对整个知识分子进行清理，认为其中一半是有问题的，通过审干——肃奸运动，让人人写“学习笔记”、“反省心得”到写“小广播调查表”，再三番五次地写“个人历史自传”、“思想自传”，作家刘白羽说，“在那难熬的日日夜夜里，惶惶不安、彻夜难眠，在上司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

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透露，“整风运动”中被杀害的有五六万，被捕过的更无法统计。毛泽东：“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权威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参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p580 香港2000年版）

延安的小文革，与五十年代的反右、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这个时代没有红卫兵可以发动，延安文艺革命是内部整肃，也不愿意扩大化，给中共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带来不利影响。毛泽东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篇讲话倡导的似乎是文艺为人民服务，而实质则是要求文化人的创作为中共的政治服务。毛泽东完成自己的核心地位、军队的党化之后，开始要求文艺政治化、党化，文化人、知识分子要成为党的喉舌，否则就被迫害，没有生路。

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抢占了党内的话语制空权：刘少奇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毛的话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刘少奇成功地拥戴了毛的领袖地位。

《东方红》歌曲（改编自延安民间小调）出现，使毛泽东通过歌曲获得文化上的神圣地位，造神运动开始了，毛氏既有思想，又有文化形象，毛的政治形象与太阳符号形成神圣的关联。

《白毛女》的出现，是中共文艺史上划时代的政治作品，这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继续，通过文艺形象，丑化地主，恶化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把农民斗地主合法化、正义化，为中共扩大后方制造民意基础、播撒仇恨的种子。正是白毛女一剧在政治上巨大的成功，才有后来江青的八个样板戏又一次达到中共红色文化的巅峰。

从延安小文革到北京大文革，我们由此发现一个规律，中共的文化革命或文化运动，开始之时，均是一场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整肃迫害，对异己“敌人”进行迫害与羞辱（戴帽子游行、批斗），然后才是宣传与文化运动跟进，而其中，伴随一场特殊的心灵改造或洗脑，

就是写检查，不停地写检查，要让每一个文字都体现你的屈服，要让每一个文字都记录下你的耻辱。

中共真的不知道写检查可能是口服心不服吗？这是一个过程，一种精神折磨与摧残，因为文化人写字，字是写在纸上，实则是刻在心中，铭心刻骨，言为心声，字则更是证据，让你在屈辱中开始扭曲自己，或者不敢继续有公开的批判精神与自由独立的状态。

而湖南农民运动中的一系列迫害人的方式，在中共建政后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文革中又大量用于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知识分子、商人、地主富农、有海外关系者，甚至抗日国军老兵、国民党投诚人员等等，因为无法忍受屈辱，许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让内部统一到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中，独立自由者要不就信服党组织的力量，要么被清除或人身消灭，“人民群众”开始相信领袖的思想力量，领袖的思想在自己的政教体系中确立为神圣，抢占了理论制高点，它的权威性就真正确立了，再加上文化宣传，六十年代造神运动的雏形，已然胎孕形成。

五十年代还有一次重要的革命，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反右，而忽略了毛泽东政治集团在这一过程中颠覆共和国的政变，反右迫害的对象是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而这些精英，正是中国政协的基本组成，中共主导的国家政治协商，使中共建政获得了合法性，也使人民共和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中共毁弃了政协，使党外没有了制约力量，这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实为反革命，因为，它将革命成果最终归于一党专政，背弃了政协联合时的承诺，使共和国成为党国。

当毛泽东在总路线人民公社这场他亲手指挥的巨大灾难中受到党内质疑时，个人威权与极权受到挑战，政治迫害与制造个人崇拜，又一次隆重上演。标志性的会议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迫害异己，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令毛泽东听了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刘少奇发言，指出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的发言，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参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冯建辉《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这一场大戏，我们看到了什么？个人崇拜不仅是党首的个人需要，也是利益集团或政治共同体的需要，利益共同体是有强大的排异性，反右是整个中共利益集团对民主、知识精英的排异迫害，而庐山会议，又一次开始在党内进行排异性迫害，彭德怀首当其冲，后来又有习仲勋、高岗等，再后来就有了刘少奇、林彪，最后甚至开始动到了周恩来的头上（批林批孔批周公）。

◇ 结束语：始于造反，终于造神

1970年11月16日接见斯诺，毛泽东曾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

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这段对话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解释，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因由，蒋介石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国民政府，中共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来凝聚战斗力，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到了庐山会议之时，为了打倒彭德怀，为了使毛摆脱五十年代一系列罪责，打倒了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又一次制造领袖崇拜，1963年中共宣传系制造了雷锋精神之后（读毛的书做毛的好战士，将整个党的军队变成毛家军，使文革有了军队保卫），1964年，十一之时，中共在经济刚刚得到恢复，隆重纪念建政十五周年，周恩来嗅觉灵敏，开始主导制作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将共产党的历史神化，将毛泽东的形象神化，某种意义上，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文革之时，文艺大旗被江青扛取，成为文革红色文化的旗手。

毛泽东与斯诺的对话可以看出，文革就是要夺取刘少奇的权力，炮打司令部，就是炮轰刘少奇的司令部，毛泽东夺蒋介石的权，始于湖南农民运动，是底层社会革命，流氓无产者被利用，通过颠覆性的革命运动，不惜流血牺牲与人伦道德毁弃，也要制造阶级斗争裂变，使革命队伍获得能量。

延安整风与五十年代的反右、庐山会议，都是通过体制内的整肃，就完成了权力集中，毁弃了政协权力，党国一体，使共和国成为一个空名词。

对刘少奇，毛泽东又一次祭起湖南农民运动方式，要搞一次全民运动，同时要将党内的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派一网打尽，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无法行政运作，毛泽东要整体上毁弃掉共产党权利体系（还包括传统文化、文物、文化知识分子、党政官员），他要建立新的革命政府，在充分发动红卫兵之后，形成一次超限战，使法律与中共规则无法执行，刘少奇手拿宪法，也保卫不了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基本人权（因为共和国已被刘少奇们早已废掉），他面对的是湖南农民运动时一样的新流氓无产者的直接专政与人身迫害。

如果用体制内的力量来整肃呢，必然还要动用体制内的部分官员，而且体制内的党政官员会按照规则与法律来比对，不能对刘少奇们形成致命的打击，所以发动红卫兵与工宣队或革命群众对异己者进行残无人道的迫害，可以根本性的解决毛泽东希望解决的问题，就是消灭对手，精神上肉体上都予以摧残、灭绝。

周恩来的行政布局与操控能力、江青的文化宣传与文化创造能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理论水平以及组织理论写作组的策划能力、林彪的号召力与极致的投入、宗教般的造圣、还有康生等人暗中组织迫害，毛泽东自己只是象征性的挥挥手，喊几句人民万岁，就达到了人类表演史上的极致，相比之下，希特勒还需要长篇讲演、煽动才达到万众欢呼的效果。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宗教与政治、现实与历史、文化与宣传、群众运动的无组织与整个文革的有力量，都达到一个堪称奇迹的高度。恶之花的完美是邪恶的完美，它的巅峰是罪恶的高峰，它的极致是反人性、反人权的极致。前面我说中共的革命战争带有宗教性质，而中共的文革，同样具有宗教性质，用制造的政治神性侵犯人权，红色教主为神圣，神圣则不可侵犯，任何侵犯者都会遭到超越法律的迫害与残害，其他人的生命在政治神圣领域如同草芥。

毛泽东成为一座人偶，他挥手，他发表最高指示，他象征性的出席会议拍拍手、挥手致意，都表演得像一个教皇，年轻一代是通过中共编造的科书来认知他，通过东方红歌曲与东

方红舞蹈史诗来崇拜他，还有无数的颂歌，以及宗教仪式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而毛泽东的异己与对手们，都被摧残或消灭。

这是人类怎样的一场文化革命运动？又是怎样的一次红色革命宗教迷狂带来的灾难？毛泽东成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了吗？马克思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实战实用的理论，秦始皇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思想，毛泽东的神圣性达到了明治维新后的天皇的地位，而他在马列教义中的地位，却又是一位红色教皇、革命教主，他可以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摩顶训诫，而任何一个看到他的人，都会有一种宗教感受。

血沃中华肥中共，红色革命造人神：从陈独秀们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一条红色的革命河流，源头有些清澈，但很快就被搅浑，整个过程血腥浑浊。它起于革命、造反，终于颠覆、造神。过程是阶级分裂、人权迫害、斗争战争，革命既是革命者权力内斗的绞肉机，又是迫害国民的绞肉机。

百年中国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灵魂革命，它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始于造反，终于造神：整个中共的革命历程如此，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也是如此。

（作者简介：吴祚来，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现旅居美国洛杉矶。）

□ 原载《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2018年9月

~~~~~

## 【往事非烟】

### 《云卷云舒——清华笔记》（选载之四）

• 傅培程 •

## 第一章 文革在清华

### 十九、揪刘火线

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随着夫人王光美的被批斗，“文革”当权者的矛头直指刘少奇，要把他从中南海揪出去。于是北京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观，称之为“揪刘火线”。

所谓“揪刘火线”，就是北京市的各个高校，各个单位，沿着中南海外墙，各搭一个属于自己学校的席棚，上书横额是“某某某学院揪刘火线”，各有自己的高音喇叭，天天朝中南海喊叫：“打倒刘少奇”！“将刘少奇从中南海揪出去”！“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等口号，这情景比农村农贸市场还要热闹，农贸市场是白天开市，晚上休市。这“揪刘火线”是天天叫喊，二十四小时“营业”。农贸市场是初一，初十赶集，这“揪刘火线”是天天“赶集”，几个月不散。与农贸市场有区别的是没有毛驴和骡子来，如果再来些牛吼驴叫的，那热闹劲儿要赛过农村的庙会。

各个高校都不甘落后，怕被人指责为“不紧跟毛主席的战略步骤”，都纷纷到中南海外墙边上去占一席之地。于是乎，中南海被几百个席棚所包围，一个席棚配一个高音喇叭，天

天乱喊乱叫，这情景创造了明朝万历皇帝建故宫以来历时六百多年从未有过的“奇观”！这情景令明清两朝几十个皇帝都目瞪口呆！叹为观止！我们的后代们做梦也做不出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周围还曾出现过这样的“杂耍”式热闹！

外面是红旗招展，喇叭乱叫的“揪刘火线”，中南海里的刘少奇日子也相当难过，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抱在胸前也阻挡不了周围人对他人身的侵犯。

据有关资料报导，后来将刘少奇押出了北京市，刘少奇最后死在了开封。一位十亿人口大国的国家主席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身亡！

## 二十一、他把相机扔掉了

清华大学有份内部报刊，叫“新清华”，其大小与“参考消息”一样大。小梁是“新清华”的摄影记者，背着一架德国蔡斯相机、经常东晃晃，西窜窜，悠然自得。小梁自称是梁实秋的侄子，不知是真是假，但有人告诉我，他真的是梁实秋的侄子。

“文革”中的一个深夜，校保卫组的人来叫他：“拿上相机，快上车走！”

他迷迷糊糊背上相机跟车走了，车开到清华大学附近的五道口铁路边停下，走了一段农田后来到铁轨边上，保卫组人对他讲：“这是我校的一位女同学，卧轨死亡，要拍几张现场照片，你各个角度拍上五、六张吧！”

说毕将盖着的草席揭开了，顺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小梁看的毛骨悚然！人已压成好几块了，血肉模糊的一堆，竟还有一个婴儿的尸体！小孩虽然也压死了，但还算是整个躯体，头顶头发已是黑的了，估计只少也有六、七个月了。

“脸部要重点照一张！”保卫组人指挥他。

这脑袋已是压碎了，哪还有完整的脸呀？！正摆弄着要“重点照一张脸部的照片”，小梁“妈呀……”一声尖叫，把相机扔掉就逃。保卫组人把他追上，问他怎么啦？见小梁吓的脸如土色，浑身颤抖，指着尸体结结巴巴说：“她舌头还在动！”

“那你相机也不要啦？你赔得起吗？赶紧照几张得了呗！”保卫组人对他讲。小梁一想也是，这架公家的蔡斯相机可赔不起，只得又回去，拾起相机胡乱拍了几张就逃回学校了。

这个经历是小梁亲口告诉我的。

这位清华女学生姓K，在校时还是个不错的学生，据说功课、品貌都上佳。可惜，她在那个不幸的年代里，有了不幸的身孕。那个年代，未婚有孕是何等的灾难！医院不准自由流产，要流产要有结婚证书，要丈夫同意，单位证明，要理由充分……哪儿去弄到这些条件？偷偷去生下来又哪儿去生呢？户户人家都住的很拥挤，谁家多了一只猫邻居都知道，还能多一个人？再说这舆论、这纪律、这闲话也会把人杀死。于是K同学在四壁无路之下，选择了清华大学附近五道口铁路上去卧轨自杀。她卧轨的姿态欲是想将孩子和自己头部全部压烂，可以无人认出来。谁知道，她口袋里的一张饭票还是暴露了她清华学子的身份。这个小孩也因为车轮一压，从肚子里挤到一边去了，还是整个人型。

“文革”中清华园里死人是家常便饭，土建系食堂后面的职工宿舍里有人用刀自刺后再跳楼的，二号楼有人跳楼的，荒岛有人上吊的，教师宿舍区有人跳楼的，清华附中有人跳烟筒的……我不知道的不知还有多少。然而K同学的死却引起广泛的议论。有人认为，为政治而死是没有办法，为生活而死是不值得了。另一部份同学不同意这种道貌岸然的观点，认为K同学是社会逼迫而死的。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如果当时社会政策宽容一点，流产可以用假名，不用证明，流产可以按个人意愿实施，未婚先孕不会受处分，K同学会死吗？那个年代极左的政治，严酷的舆论，困难的环境，逼迫一个未婚先孕的清华学生走上了绝路。那个年代，与K同学一样命运的女子不知又有多少？！

正是无数个K同学这样鲜血淋漓的悲剧才慢慢唤醒了社会的良知，正是社会的进步才打碎了桎梏在道德与制度上的极左枷锁，才有了现今社会比较宽容的未婚先孕自主处置权。大凡社会的进步，良知的唤醒，都要人们付出沉重的甚至是鲜血的代价！

### 三十三、妙书独阅

一九六七年初，春节前后，清华园里不少同学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与老胖子等少数几个同学仍住在校里，闷的发慌。有一天，我俩闲散地游荡在校园里，信步向土木建筑系系馆走去。昔日不太敢进的系馆，现时已无人办公，荒凉无比。门口是一堆打碎的石膏像，垃圾成堆。地上散落着不少学生的作业，我捡起其中一张人头素描画，极具功力，画的可能是“海盗”石膏头像。又捡起半张彩色的总平面设计图，也相当有水平，遍地都是宝呀！这些可能都是优秀学生作业拿到系馆来陈列的，现在都满地散落了。办公室的门在西风中吱呀作响，整个系馆已不见一个人影，自从清朝末年建立此馆（清华学堂）以来，目前也许是其最荒凉破烂的时刻了。

清华土木建筑系系馆是清华园里最早也是最有魅力的建筑物，她始建于清末，门首上方有“清华学堂”四个字，灰砖墙体，造型美观，平面布局灵活又合理，与清华大礼堂相互映衬，是清华园美丽校院的重要组成部份。我俩沿着系馆右边走道继续走进去，到底是到了系图书馆门口了。往门里一望，居然见到里面还有一个人！在这寒风抖索的冬日里，他是谁？在干吗？我们怀着好奇心推门进去看看，原来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者。他见有生人进来，客气地与我俩打招呼：“同学，你们好！”

“您好！这么冷天，也没有暖气，您受得了吗？您是系里的职工吗？”我问他。

“我是系图书馆管理员，在这里干了多年了，学生都停课闹革命了，我还上我的班，我天天早上八点就坐在这里了。”他嚅嚅地告诉我他的身份。

“你真老实，别人都不上班了，你还上它干嘛？再说暖气都停供了，还不冻坏你？”我们叫他别上班了。

“咳！我与书相伴几十年了，我不愿意离开书，坐在这里挨冻比坐在家里心里踏实。”他边说边不住地用嘴在手上哈气，手已冻的通红。

真是一位敬业的长者！我们一边与他聊天，又一眼望见房间地下竟有一个大水坑！里面有满满一池子水，这水不知是设备坑积水还是地下室进水了，这一池子冻水，老者真象是坐在冰窟上！我看着他卷缩的身体，冻的通红的双手和耳朵，孤零零一个人独守着图书，敬意油然而生。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给你去弄只铁皮桶来，捡些木条，让你烤烤火怎么样？”

“嗨，不行，不行。图书馆里绝不能有火种。”他坚决拒绝了。

我们浏览了一下书架，一排毛主席的著作摆在了入口处最显眼的地方，我想这是装门面的，其它大都是一些工程书。

“大伯，我们想跟您商量个事，您能否将建筑系馆藏的画册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我试探着问他。我知道系图书馆有一批好画册，平日连学生都不借的。

“谁告诉你系图书馆有画册？”他反问我。

我说，校图书馆里我认识一位工作人员，他告诉我的。

“这可都是‘四旧’呀！红卫兵看见都要烧掉的，你们不是已看到门口一大堆石膏象已砸烂了？”他说。

“这大冷天的快过年了，谁也不会来的，把我俩关在里间，我们悄悄看，谁也不会知道，大伯你帮个忙吧！”我恳求他。

也许我们太寂寞了，也许难得有人大冷天到系馆来，也许我俩看上去还是一个本份的人，这年头，想看这些画册的人已不多了，不管什么原因，老者同意了，他说：“我给你们看一部份画册，你们可别出去说，更不能带人来，知道吗？”说毕，他走到书柜背后，从一个不易被人注意的旧书堆下面，抽出几本精心包装过的画册来，看的出来，他是用心藏着的。我们接过画册，嗨！好重！好精致！是欧洲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博物馆藏画画册。我翻开一看，天啊！这么美的画！这么逼真的技法！画中的人物、动物、山水、花草、静物、都栩栩如生！造型、色彩都美到了极点，真让人叹为观止！我的手微微颤抖，这是我俩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的艺术珍品，虽不是原件，是画册，但已令我们激动不已。惊叹人类文明的精美和博大。有些作品已有几百年历史了，不少国家都建立博物馆，小心地保护着这些艺术珍品。又将博物馆藏品印成精美的画册，向世界人民展示自己民族的才华和人类的智慧，给后人以崇高的艺术享受。

看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吧！大量的艺术品当作‘四旧’在破坏掉，多少文物、古建筑、寺院在被毁掉！例如中国佛教第一寺白马寺被毁掉，岳飞坟被挖掉、多少百年老店被毁，“文革”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令世界震惊，“文革”对人类文明是一次灾难深重的浩劫！

我俩在系图书馆小房间里关了好几天，如饥如渴地翻阅着各种精美的图书和画册，其中还有一大套苏加诺画册，印尼总统苏加诺竟还是个大画家！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我与老胖子真要感谢土木建筑系图书馆的这位老管理员，在中国文化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年代里，这位老伯让我们领略了人类文明的伟大、广博和魅力。真要谢谢他！

### 三十四、中山公园内的暴行

“文革”年代，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边上的中山公园内，设立了一个串联学生乘火车办理乘车证的窗口，凭学生证可以在此窗口里领到一张乘车证，有了乘车证，就可以免费乘火车了。

有一天，我去中山公园办理乘车证，为排队谁在前，谁在后的区区小事，两帮学生吵了起来。一帮是东北学生，一帮是四川学生，看他们的岁数都在十六、七岁样子。吵着、吵着，双方就动起手来了，这一动手就不得了，两帮学生纷纷四处找可以当武器的家伙，大家都看上了中山公园里护花池的木栏杆。这木栏杆是深绿色的，有八十来公分高，有四四方有棱有角的方木柱，大家都拨出方木柱来当武器。互相对砸，不一会儿、东北帮学生被打败了，落荒而逃。四川一帮旋风般猛追，一会儿，一个东北学生被追上了，六、七个人乱棍齐下，很快这位东北学生被打成了一个血人，在花池边上倒下了，脑袋上的伤口血流如泉涌，

白色脑液也流了出来，很快就死了。四川一帮还不甘休，又旋风般地去追逃跑的另外一些东北学生。

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排队的学生眼前，大家都叫喊：“别打了！别打了！出人命啦！”但无济于事，双方杀红了眼。

为了排队谁前谁后，就这么吵，这么打，直到打死人！天安门城楼下的中山公园，这位置是真正的“天子脚下”！“天子脚下”就可以这么随便的行凶杀人，打死一个人如同打死一只兔子。

疯了的年代！  
疯了的学生！

本应在课堂里琅琅读书的十六、七岁的孩子，怎么会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就这么瞬间消逝？中国的首都可以变成这样没有法制？几十万公、检、法队伍在“文革”运动前面都绑住了手脚？谁应对此负责？谁造成了中国社会如此充满暴力和混乱？良心、法制和道义都在敲击着中华大地！在大声喝问着苍天！

北京城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故宫以来，历时五百多年，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下随便杀人的情况，只有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年代里才出现过，封建皇朝都不允许！

#### 五十、烟囱上要跳下来的人

入冬前，我又返回到了学校，“文革”中一个寒秋的下午，清华大学体育馆锅炉房的大烟囱下围了一大堆人，凡是围满人的地方总会有事情，我也轧闹猛过去看看。

原来体育馆锅炉房烟囱顶上站着一个人！一大幅白布黑字的条幅从烟囱顶部一直挂下来，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黑字：“摘掉我的右派帽子！为我平反！”

他一手拿根长竹杆，一边不断地在上面尖叫着：“不给我平反就跳下来！”

长竹杆端部有利器，谁上去就戳谁。

在“文革”极左的岁月里，一个“右派”敢于在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以站在体育馆烟囱顶准备跳亡的极端方式，向当局挂出抗议条幅，作出“为我平反”的呐喊，这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无异于黑夜旷野中的惨烈吼叫！敢于这样公开的呐喊，其结果他是必死无疑的！但对极左当局来讲，在首都北京的最高学府里，这样惨烈的抗议影响深远，震惊人心，震惊社会！

“文革”岁月，是“右派”们最悲惨的日子，个个被打的死去活来。这位爬上烟囱顶的“右派”也计算过，与其被活活打死，还不如死前公开喊出全国“右派”们一句共同的心底话：“为我平反！”向世人展示其惨烈抗议之后，再一跳而死。

醒目的大幅白布，一米见方的抗议黑字！震惊着整个清华大学，消息很快传遍到首都各高校，极左当局怎能容忍如此造反？按他们说法这是活生生的“右派翻天！”有几个人沿着烟囱爬梯爬上去，想把他揪下来，但这位“老右”还十分机灵，他很快发现有人爬上来了，

在几十米高的烟囱顶部，他挥舞竹杆，猛往下戳！坚决不准人靠近他。就这样坚持到天黑，也没有人能把他揪下来。

天色已黑沉了，烟囱上仍有一个拿着长竹杆的黑影，他象一尊雕塑、黑夜中屹立着，抗议的布幅仍在寒风中摇晃着。他此举是必死无疑的，在这血腥的年代里，他敢于这么做，无疑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写下了惨烈的一笔！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中，比中国“右派”群体更冤屈的人群是少有了。秦始皇坑儒才埋了几百个书生，二千多年来尖锐评击之声不绝，中国的右派抓了五十五万，（中共党史二卷中承认的数字）可以装满六千节火车车箱！那还不算他们的家属子女。

□ 原载傅培程著《云卷云舒——清华笔记》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